

自画像的征服：国家何以在“理性”尽头走向战争

战争研究长期被一个悖论所缠绕：战争常常不在安全机制失灵时爆发，而在国家安全机器被一套“理性优化”技术全面武装之后变得无可挽回。本文的追问从这一悖论启程，但拒绝将其归责于一个无面孔的“系统逻辑”。通过逐层撤销“国家作为单一理性主体”这一深层预设，本文逼出一个新判断：驱动国家越过战争门槛的核心动力，是一群面临沉没成本与身份焦虑的决策者，围绕“我们是谁”这一问题展开的权力场域征服。

作者 阳涌 · 约 1.8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战争研究长期被一个悖论所缠绕：战争常常不在安全机制失灵时爆发，而在国家安全机器被一套“理性优化”技术全面武装之后变得无可挽回。本文的追问从这一悖论启程，但拒绝将其归责于一个无面孔的“系统逻辑”。通过逐层撤销“国家作为单一理性主体”这一深层预设，本文逼出一个新判断：驱动国家越过战争门槛的核心动力，是一群面临沉没成本与身份焦虑的决策者，围绕“我们是谁”这一问题展开的权力场域征服。在此过程中，一幅特定的国家自画像——坚毅的、不退缩的、能够承受任何代价的——通过官僚竞争的审美化与话语的身份净化，压制了其他可能导向审慎与克制的自画像。战争的“必然性”因此不是被优化逻辑计算出的唯一解，而是被一个特定自我叙事所专断地宣布的唯一结局。本文以1965年美国升级越南战争的决策为核心案例，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克制决策形成对照，展示自画像竞争结构在“身份受威胁”这一常量中作为关键分岔变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系统对话“本体安全”“历史类比”“官僚政治”“群体思维”“承诺升级”五组竞争性解释，逐一切开其辨别面上的盲区。本文的结论是：维系和平的条件，不在于更精密的风险算法，而在于国家安全文化是否有制度能力，在某一幅自画像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前，为另一个声音——那个问“我们是否可能错了”的声音——保留一个有尊严的席位，且这一席位的存续不取决于个别领袖的雅量，而取决于一种蓄意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战争起源；自我意象；安全决断；越南战争；官僚政治

一、引言：在“算计”与“冲动”之外

战争为何反复发生？每一个时代给出的答案，都烙印着那个时代对自己理性能力的确信程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将战争归因于贪婪、恐惧、安全困境的结构性压力，或是领导人的误判与疯狂。这些解释各有其锋利之处，但它们共享了一种隐隐的不安：为什么人类能够在无数次危机中成功刹车，却偏偏在那些最致命的关口，明知前方是悬崖，仍然径直冲了下去？

一个在冷战时代逐渐成型、并在其后持续发酵的批判路径给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回答：问题不出在决策者的愚蠢或疯狂，而出在他们太“聪明”了。战争的根源并非安全机制的故障，恰恰相反，它是安全机制被“理性优化”到极致后的非预期排泄物。当一套国家安全体系以绩效最大化、冗余最小化、核算全覆盖为核心纪律运转时，它会系统性地消灭外交转圜所需的不确定空间、危机管控所需的制度冗余，以及克制退让所需的非核算余裕。当系统唯一能识别的“理性”只剩下一条路时，战争就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被“最优算法”自动结算出的唯一出口。

这一论述极其有力，其思想谱系可追溯至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铁笼”的忧思，雅克·埃吕尔对“技术自主性”的警告，以及詹姆斯·斯科特关于“极端现代主义”导致国家项目失败的经典研究。在安全研究领域，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经典著作《决策的本质》中，曾以“组织过程模型”揭示美国官僚机器的标准化作业程序如何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锁死某些选项、又在越南战争中放大某些惯性。而在更晚近的讨论中，赫伯特·麦克马斯特在《渎职》一书中具体地展示了：林登·约翰逊政府内部的系统分析技术、成本效益核算与博弈论建模，如何赋予特定选项以“科学正确性”的外观，从而系统性地排斥了那些无法被量化、却可能更明智的审慎声音。

这一批判路径的锋刃在于，它精准地切开了国家机器内部的制度化操作：系统分析的量化技术如何将不可言说之物默认为零；官僚竞争如何在“最不亏”的军备竞赛中封死了克制的出路；话语净化机制如何将异见预先编码为“不专业”或“不忠诚”。这些手术刀般的剖解，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比“政客的野心”或“军人的鲁莽”更隐蔽、也因此更可怕的战争制造者——那个被我们奉为圭臬的“效率”本身。

然而，在抵达这一看似坚实的地基之后，一个难以回避的裂缝出现了。当我们将战争归责于“系统的理性优化”时，我们是否无意间将“系统”变成了一个新的、不会犯错的巨人？它没有灵魂，没有恐惧，没有荣誉需要捍卫，没有在深夜面对自己可能犯下滔天大错的战栗。它只是忠实地、冷酷地执行着被植入其体内的优化程序，然后吐出“战争”作为最优解。

但真实的决策现场不是这样的。1965年夏天的白宫，不是一个静悄悄的计算机房。那里充满了愤怒、恐惧、虚荣、忠诚、背叛、对历史评价的极度焦虑，以及对自己正在做的事可能是一个巨大错误的深刻不安。将这些沸腾的人性熔岩全部归结为一个冷冰冰的“优化逻辑”，可能恰恰掩盖了驱动战争的最隐秘、也最顽固的燃料。

由此，本文的追问从这样一个缺口启程：如果优化逻辑不是那个最终的制动者，而只是一套被特定集团在特定时刻有选择地亲附的权力语言呢？如果那个做出“唯一解”的主体，不是一个统一的理性计算器，而是一个被撕裂的、充满矛盾的、试图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拼命维持一个体面自我形象的政治团伙呢？

本文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发生学追索，逐渐逼出一个判断：战争爆发最根本的动力，往往不是系统的优化逻辑锁死了选择，而是决策集团内部相互竞争的多幅“国家自画像”中，某一幅通过权力场域的征服手段，压制了其他可能导向克制的自画像。简言之，一个国家走向战争，不是因为所有的路都被算死了，而是因为在那个需要做出最终决定的历史关口，决策者用以维系自身集体身份的一幅特定自画像——坚毅的、绝不屈服的、言出必行的、能够承受任何代价的——征服了其他自画像（审慎的、灵活的、能够承认错误的、重视长远代价的）。战争的“必然性”，并非一个逻辑命题，而是一个叙事胜利。它是那幅赢了内部斗争的“自画像”，对尚未发生的未来所做的一次专断宣判。

本文所称的“自画像”，指的是一群决策者关于“我们是谁”的一套连续性叙事。它由历史记忆、道德承诺、权力地位与集体情感凝结而成。它不是一项可被“优化计算”的政策，而是政策得以被“认为合理”的情感与身份地基。当这个地基在特定的压力下发生倾斜时，决策就可能从“权衡利弊”滑向“捍卫身份”。战争，往往是“捍卫身份”的极致形式。

为论证这一判断，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节将与既有解释路径进行一次剖筋剔骨的对话，将它们的洞见推至共同边界，暴露其“单一理性主体”的先验预设。第三节将撤销这一预设，并论证：为什么在战争决策的临界点上，“身份”维度比“利益”或“认知”维度更为根本。第四节建构自画像征服的发生学机制，展示身份焦虑、官僚竞争的审美化与话语净化如何不是三个各自成立的“条件”，而是一条彼此催化的生成链条。第五节以此框架重返1965年越南升级决策，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克制决策形成系统对照，展示自画像竞争结构作为分岔变量的作用。第六节与本体安全、历史类比、官僚政治、群体思维、承诺升级五组竞争理论展开系统对质，完成不可还原校验，并给出明确的证伪条件。第七节是结论，指出维系和平的条件在于，国家安全文化是否有制度能力，让没有任何一幅自画像能够永久垄断叙事。

二、既有解释的锋刃与边界

在直抵本文的核心判断之前，有必要与那些最强健的既有解释进行一次认真的辨析。它们不是本文欲一举推翻的稻草人，而是各自在特定维度上切开了战争决策黑箱的锋利工具。本文要做的，不是否认它们的洞见，而是追问：在它们各自锋刃所及之处，是否有一个它们共同遗漏的盲区？

麦克马斯特在《渎职》一书中，对1965年越南升级决策进行了或许是迄今最详尽的制度性解剖。他的核心论证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系统性地欺骗了总统和公众，通过隐蔽地夸大军事进展、掩盖不利情报和搁置撤退选项，使战争升级成为官僚机器惯性运转的必然结果。这一诊断极其锐利，

它将罪责从“总统的误判”转移到了“军事机构的系统欺骗”。

但这一诊断在做到“精确定位罪责”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本体论置换：它将一个充满了裂隙、矛盾和身份焦虑的决策集团，重新叙述为一个“被官僚机器裹挟的总统”与一个“系统性欺骗的军事机构”之间的二元对峙。在这个叙事中，约翰逊总统被描绘为一个无意开战、却被将军们蒙蔽的悲剧人物。然而，这一叙事难以回答一个后续研究——包括罗伯特·达莱克在《有缺陷的巨人》中的总统传记研究——反复揭示的事实：约翰逊并非简单的受害者。他在无数个深夜里，并非因为“不懂”而做出增兵决定，而是因为他无法面对“从越南撤退”所隐含的那一幅自我肖像——那个“第一个输掉战争美国总统”。

艾利森的“组织过程模型”与“官僚政治模型”，提供了另一套有力的手术工具。前者揭示：标准化作业程序并非中立的效率工具，它们预设了特定的威胁脚本和应对菜单；后者揭示：不同官僚机构基于其组织利益与身份立场进行博弈，最终的结果不反映任何单一的“国家理性”，而是“你站在哪里取决于你坐在哪里”的博弈均衡。这两个模型将“国家”从单一理性主体的神坛上拉了下来。

然而，它们在战争决策这一特定问题上的共同盲区在于：它们处理的是“利益/立场”的博弈——这种博弈在原则上是可以被妥协、被交易、被轮换的。你可以在预算之争中用一座空军基地换取一座海军造船厂。但越南决策的核心困境不是利益博弈。鲍尔反复论证的是：这场战争不值得打，不仅是因为它赢不了，而是因为它本身是错误的。这不是一个可交易的立场——这是一个涉及“我们是谁”的存在性叙事。当鲍尔说“这会耗尽帝国的根基”时，他触及的不是预算分配的零和博弈，而是一整幅自画像的合法性——那幅作为“自由世界坚毅卫士”的自画像。这正是艾利森的官僚政治模型切不开的辨别面。

从认知心理学介入的路径，以尹瑞·康的《类比之战》为典范，同样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康精细地展示了：美国决策者如何被“慕尼黑类比”这一历史意象所俘获，将越南局势强行纳入“独裁者的侵略不能被姑息”的认知框架，从而系统性地排斥了所有不符合这一框架的信息和选项。这一分析极有解释力。但本文要追问的是：历史类比是“被拿来用的”认知工具，还是“被拿来成为的”身份叙事？

换言之，“慕尼黑类比”对于腊斯克和约翰逊而言，不仅仅是一个解释当下局势的认知框架。它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构成要素。腊斯克不是“误以为”越南是另一个慕尼黑——他是作为“慕尼黑一代”的外交官，在职业生涯的每一道年轮里都刻着“我们绝不能重蹈对侵略者姑息的覆辙”这一身份烙印。当他使用这一类比时，他不仅在分析局势，他还在宣誓自己是谁。这一从“认知”到“身份”的不可通约性，正是康的分析利器所切不到的那一层。

综合来看，上述既有解释各自的锋刃共同指向了一个边界。这个边界的标志是：它们都将战争决策主体预设为一个——无论内部多么复杂——最终仍可被某种统一逻辑（官僚惯性、组织利益、认知框架）所涵盖的分析单元。即使它们承认决策系统内部存在多元主体（如艾利森），它们也将

这些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预设为“利益博弈”或“立场竞争”，而未曾追问：当这种竞争涉及的不是可交易的利益，而是“我们是谁”的存在性叙事时，它遵循的还是同一种逻辑吗？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本文的追问从既有解释的边界处启程。下文将逐层撤销那个被共享的预设，让一个新的判断从预设崩塌的裂缝中浮现。

三、撤销预设：当“国家”不再是一个单一主体

上一节将既有解释推至其共同边界。本节执行一套严格的发生学追索：在这个边界上向下钻探，逐层撤销其赖以成立的底层预设，直至让一个新的判断从裂缝中结算出来。

一、这个领域最折磨人的矛盾是什么？

国际安全研究中最漫长、也最折磨人的矛盾是：为什么那些最终导致灾难性战争的决策，在发生的那一刻，对于决策者本人及其所在的建制而言，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视为“在当时情况下最合理、甚至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一战的七月危机、越南战争的升级、伊拉克战争的情报误用——事后复盘总是清晰地指出多条可行的替代路径，而这些路径在当时并非无人提出。矛盾的痛苦之处在于，一群极其聪明、掌握海量信息的人，集体地、有条不紊地走向了他们中间许多人私下里认为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深渊。这不是认知失败——他们知道得足够多。这是一种更深的扭曲。

对此，既有解释反复提供了一个修正主义答案：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他们的聪明被一套只承认特定理性的官僚纪律或认知框架所捕获，走到了理性的反面。合理的人，在合理的制度中，按照合理的程序，做出了不合理的决定。这个答案揭示了比个人愚蠢更可怕的机制。

然而，这一答案在它自己的领域内遭遇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反例：为什么那些同样拥有高度理性化的内部决策系统的国家——如冷战期间的美英——在多次危机中并没有“理性地”走向战争？麦克马斯特的制度欺骗、艾利森的组织惯性、康的历史类比——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同样存在，但肯尼迪政府选择了封锁而非空袭。如果官僚惯性、认知框架是那个关键的加速变量，为什么在制度结构相似、历史类比同一（慕尼黑类比在1962年同样被反复提及）的情况下，结果截然相反？那个导致分歧的变量，必然在别处。

二、这些解释背后，大家默认为真的先验假设是什么？

这个先验，就是将国家决策系统预设为一个——无论其内部如何复杂、如何多元——最终仍可被某种统一逻辑所解释的分析单元。这个“统一逻辑”可以是组织过程的惯性、官僚博弈的均衡、或是认知框架的锁定，但无论如何，它都假设在整个决策系统的底层，存在一个可以被识别、被描述、被批判的单一“语法”。

由此，一个更深层的预设在暗中运作：它假设战争的根源在根本上是认知问题或利益问题。“如果我们知道得更多、算得更准、制度设计得更好，就不会打仗。”因此，所有批判的落脚点，都在于揭示认知如何被系统地扭曲、或者利益如何被官僚化地锁定。战争被归咎为认知的失败或利益结构的缺陷——知道得不够，知道的方式被扭曲了，或者利益被错误地配置了。

三、如果撤销那个先验，会打开什么？

撤销“决策系统存在单一底层逻辑”这一预设，就等于承认一个更真实也更混乱的画面：决策现场不是一个在既定语法下运行的计算机——即使是出了故障的计算机——而是一个被诸多相互竞争的、由不同的人与群体所承载的“自画像”所撕裂的角力场。

在这个角力场中，不同的集团并不仅仅在为了不同的“选项”（封锁还是空袭？增兵还是撤军？）而争辩。他们是在用不同的选项来捍卫各自心目中“我们是谁”的核心叙事。“我们是一个绝不会在讹诈面前退缩的大国”——这个叙事不仅指向一个政策选项（空袭/增兵），它更指向一幅自画像。放弃这个选项，不仅仅是放弃一个策略，更是放弃那幅自画像所担保的“可敬的我们”。“我们是一个懂得审慎克制、能够从长远代价计算中做出痛苦选择的大国”——这个叙事同样指向一幅自画像，也指向另一套政策选项（封锁/撤军）。

在常规的政策辩论中，这两幅自画像可以通过妥协来共存——你可以在一场危机中选择强硬，在另一场中选择克制，而你的“自画像”仍保持整体的连续性。但在某些临界时刻——通常是在沉没成本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而撤退在叙事上等同于“承认之前的牺牲全无意义”的时刻——这两幅自画像的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此时，它们争夺的不再是政策选项的优劣，而是“谁有权定义我们”。

由此，本文追问的方向发生了一次关键的转向。政治决断——尤其是战争与和平的决断——在其最深的层面上，不是认知问题，不是利益问题，而是身份问题。它最终不归结为“我基于证据判断此为最优方案”，而归结为“我作为这样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化身，在此历史关头，必须做出这个决定，否则我就不再是那个该被历史所接受的我”。战争驱动力，因此不在认知失效之处，而在身份焦虑被特定条件引爆、且在权力场域中未能被有效制衡之时。

四、为什么是“身份”，而不是“利益”或“认知”？

一个尖锐的质疑必然在此处被提出：撤销“单一主体”预设之后，为什么打开的是“身份”维度，而不是艾利森式的“多元官僚利益”博弈，或马奇式的“组织模糊性”？这是一个必须被正面回应的问题，否则本文的整个进路就是一次未经奠基的选择。

利益可以被交易，认知可以被修正，但“我们是谁”的叙事一旦面临被历史判定为“失败者”的威胁，所触发的是一种存在性焦虑——这种焦虑的不可交易性，使其成为战争决策临界点上的最终制动力。这不是一个程度差异，而是一个维度差异。

让我把这一区分具体化。当两个官僚集团争夺国防预算时，它们之间的竞争遵循的是利益博弈逻辑：你让一步，我退半步，最终在某个均衡点上达成妥协。即使某一方暂时失势，它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身份”被否定了——它只是输了这一局，下一局还有机会。但当鲍尔说“增兵不会赢，只会耗尽帝国的根基”时，他提出的不是一个可以被“部分增兵”来满足的利益诉求。他是在挑战那幅“坚毅的全球卫士”自画像的合法性本身。这种挑战触动的不是利益损失带来的失望，而是身份被否弃所引发的存在性恐慌——“如果他是真的，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坚毅都变成了愚蠢，我们所有的牺牲都变成了徒劳”。在这种恐慌面前，没有办法“妥协”。只能征服，或者被征服。

同样，认知框架的锁定与身份叙事的不可交易性之间也存在质的断裂。康所分析的历史类比确实可能将决策者“锁死”在特定的认知轨道中。但这种锁死在原则上是可以被“新信息”或“反例”所解除的。如果有足够强的证据表明“这一局势真的不同于慕尼黑”，理论上认知框架可以被修正。但身份叙事不同。约翰逊总统对撤退的核心抵抗，不是他看不懂麦克纳马拉的量化表格中那些暗淡的预测数字——他看到了。档案和回忆录显示，他在深夜反复阅读鲍尔的备忘录，被其内容所困扰。他真正无法面对的，不是“赢的概率低于50%”这个认知判断，而是“美国大兵白白死在越南”和“林登·约翰逊是那个丢掉越南的总统”这两句判词——它们将彻底击碎他一生所信奉的“伟大社会设计师”与“自由世界卫士”这两幅自画像。这是一种叙事意义上的死亡威胁，不是可以用“更多证据”来缓解的认知更新。

由此，在战争决策的临界点上，身份维度压倒利益维度与认知维度，不是因为它“更重要”，而是因为它不可交易、不可修正、不可被新信息所软化。这就是为什么当其他变量——地缘利益、军事能力对比、对方行为——较为恒常时，“自画像征服”作为自变量，解释了为什么决策系统会专断地锁定“战争”而非其他替代路径。

五、在哪个具体反例上，既有的单向解释会崩解？

回到1965年。在约翰逊政府的决策核心里，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曾孤独而有力地论证：增兵不会赢，只会陷入无底洞。据《五角大楼文件》汇编及后续研究（如戴维·哈伯斯塔姆的《出类拔萃之辈》），鲍尔的备忘录并非毫无分量。它们引起了约翰逊本人的深切不安——总统没有把它们扔进垃圾桶，而是在深夜反复阅读、在与幕僚的私人谈话中多次提及。

然而，正是这种不安本身，需要被压服。压服它的，是麦克纳马拉用系统分析语言所提供的——不仅是一套“更优的数据”，更是一种强大的自我说服与相互说服的媒介。这套语言以及它所象征的整个姿态，告诉总统：你不是在拿青年们的生命去为一个失败的事业冒险；你只是在按照当前最科学、最理性的管理技术，做出一个“在目前所有信息下最合理的决定”。这套语言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更科学”，而是因为它与“我们是最聪明、最理性、最现代化的管理者”这幅自画像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选择性亲和。它是那幅自画像得以被维持和施展的权柄。以它之名，总统的道德焦虑被暂时压制，那个可能要在历史上被书写为“失败者”的自我意象被暂时拯救。

由此，一个关键的反例便可清晰辨认。在那个决策临界点，真正锁死选择的，不是作为中立的优化工具的系统分析，而是与一幅特定自画像结成了选择性亲和的系统分析。它被决策者视为维持那幅自画像所必需的自我说服的语言。工具没有被用来“锁死”人；人死死地抓向了那件能够维系其自画像不崩塌的工具。战争，是这场抓取的结算物。

四、自画像如何在权力场中促成战争：一个发生学机制

上一节通过逐层追问，从既有解释的失效处逼出了“自画像征服”这一新的判断。但判断不能仅靠定义存活，它必须在真实的决策纹理中展示其运作机制。本节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一征服如何在真实的权力场域中发生。

必须预先声明：下文区分的三个层面——沉没成本的叙事转化、官僚竞争的审美化、话语的身份净化——不是为了提供一个“满足A+B+C即可诊断”的发现学清单。在真实的历史中，它们不是三个各自完备的“条件”，而是三种相互催化的机制张力。每一次具体的征服，都是这三股力量在特定情境下彼此挤压、彼此强化、彼此扭曲的独特结算，而非一份通用诊断表上的三点对勾。

一、沉没成本的叙事转化：从“损失”到“血债”

行为经济学早已揭示，决策者倾向于在已经投入的沉没成本之上继续加码，以规避“承认损失”的痛苦。这一机制确实在战争升级中扮演了角色。但自画像征服所关涉的，不是沉没成本的“经济核算”，而是它的叙事转化。

在决策者的自我叙事中，已经付出的成本——花掉的钱、牺牲的士兵、公开的承诺——并不被体验为可以用另一笔收益来冲销的“坏账”。它们被重新编码为“神圣的牺牲”。撤军，因此不再是一个理性的止损决策，而是一个道德上的亵渎行为：它将之前所有的牺牲——战场上的生命、公众的承诺、国际信誉——全部重新定义为“无意义的”。对于身处决策中心的人而言，接受“我们之前的牺牲是无意义的”，就等于接受“我们之前的一切行动可能都错了”。这不只是利益上的损失，而是支撑其整个公共生涯与自我理解的叙事地基的垮塌。据达莱克和其他传记作家的研究，约翰逊总统对撤退的核心抵抗，恰恰不是数据层面的——他反复回到的，是叙事层面上的恐惧：他无法面对“美国大兵白白死在越南”和“林登·约翰逊是那个丢掉越南的总统”这两句判词。它们将彻底击碎他一生所信奉的自画像。在此意义上，每一份新的增兵计划都不是新投入，而是为那些已经凝固的“血债”寻找一个未来的救赎叙事：用未来的胜利，证明过去的牺牲并非徒劳。

二、官僚竞争的审美化：效率作为特定自画像的身份徽章

在此过程中，官僚竞争并非单纯围绕预算与权限展开的利益博弈。它同时是一场关于“谁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治理者”的身份之战。不同的官僚集团承载着不同的自画像，而这些自画像各有其独特的审美风格与身份标记。

麦克纳马拉的系统分析技术之所以能在五角大楼内部取得支配性地位，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方法论“更科学”。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它代表着一种更高级的自我形象：理性的、现代的、简洁的、由常春藤精英操持的。它是“新边疆”一代决策者用以区分自己与“没受教育的旧式将军们”的身份徽章。反观传统军种的计划与外交官的古老智慧，在审美上被感知为滞重的、陈旧的、直觉驱动的，与决策精英们想要的“现代化管理者”身份格格不入。因此，当麦克纳马拉在会议上展示那些电子表格时，他所做的远不止于呈现数据。他是在象征性地宣布：我们这一边拥有“科学”——也就是拥有新时代的合法性；他们那边只有“直觉”——也就是属于一个正在过时的旧世界。据哈伯斯塔姆的叙述，这种审美等级在当时的权力场域中是真实可感的，它不仅仅是一种修辞，而是影响了谁的声音被认真对待、谁的声音被礼貌忽略的权力配置。选择系统分析的结论，本身就是对“我们是现代化管理者”这一自画像的确认；质疑它，则在身份的坐标系里被悄无声息地重新编码为“守旧”和“不专业”。

三、话语的身份净化：异见作为“我们中之非我”的祛除

在前述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决策圈内的异见越来越难以作为一种“另一种可能正确的判断”而被认真对待。相反，它们被一套身份话语重新归类：那些主张审慎和克制的声音，在论证层面被驳倒之前，先在身份层面被判定为“不属于真正的我们”。

在越南决策中，鲍尔的反对意见被贴上“欧洲中心主义者”和“悲观论者”的标签；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的批评被解释为“酸葡萄心理”；著名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警告则被视为“不懂军事的文人空谈”。这些标签的要害在于，它们不回应论证，而施行身份驱逐。它们向决策圈内的“我们”传递一个信号：那个声音来自一个不属于这个集体的人——一个“政客”、一个“文人”、一个“旧欧洲”。这种人，不拥有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军事决策上发言的“身份资格”。当这种身份净化完成后，决策圈内剩下的“我们”，便共享了一个越来越单一、越不包容克制的自画像。此时，那个唯一留下的“我们”所能看见的唯一出路，就是继续战斗。和平，不是被算没了，而是作为“异己”的主张，在一场沉默的身份清洗中被预先逐出了可能的选项集。

这三种机制之间不是并列满足的关系，而是环环相扣的生成链条。沉没成本的叙事转化，为决策者制造了一种必须被压服的道德不安——撤退变得不可承受，因为它在叙事上等同于亵渎。官僚竞争的审美化，则为征服这种不安提供了强大的武器——系统分析及其所象征的“科学管理者”身份，被决策者视为能够用“合理性”来覆盖内心焦虑的自我说服工具。而话语的身份净化，则是这一链条的收束：它将那些仍在提醒不安存在的声音，从“我们”的集体身份中剔除出去，让决策者能够在

一个排他性的自画像中，获得暂时的、暴烈的一致性。

五、两个危机时刻：1962与1965的对照

上一节建构了机制。本节将其带入两个具体的危机现场，通过系统对照展示自画像竞争结构作为分岔变量的作用。选择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与1965年越南升级决策进行对照，是因为二者在多个关键变量上高度相似——同一套国家安全建制、同一代决策精英、同样被“慕尼黑类比”所笼罩、同样面临核大国对峙的极端压力——却在最终结果上截然相反：一次以“封锁”这一审慎克制的中间选项收场，一次以大规模升级告终。这一对照能够最清晰地揭示：当“身份受威胁”这一背景常量在两个案例中均在场时，导致分岔的那个变量，是自画像竞争的结构，而非官僚惯性或认知框架。

一、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多幅自画像的有效竞争

1962年10月，肯尼迪政府在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之后，面临着一个经典的安全困境。据“执委会”（ExComm）会议录音及相关研究，在最初的讨论中，空袭方案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几乎一致支持。空军参谋长柯蒂斯·勒梅将军以极其强硬的语言主张立即空袭，他的论证不仅基于军事必要性，更充满了一种“我们绝不能表现出软弱”的身份叙事——这正是“坚毅的战士”自画像的典型表达。

然而，不同于1965年越南决策的关键在于：在ExComm的制度空间中，其他自画像有足够的制度性资源进行有效竞争。“理性的危机管理者”自画像——由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此时尚未被越南困境所捕获）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共同承载——系统地质疑了空袭方案的不可控后果：苏联可能的报复、柏林可能被占领、核升级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审慎的外交家”自画像——由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承载——一度提出以美国从土耳其撤除过时的木星导弹来换取苏联从古巴撤弹的方案。尽管这一方案在ExComm会议中被肯尼迪总统私下嘲讽为“慕尼黑式的绥靖”，但它毕竟在制度上被认真讨论了。罗伯特·肯尼迪在事后回忆中承认，史蒂文森的立场虽然被否定了，但它迫使其他人更严肃地思考“给对方一个体面的退路”的重要性。

最终胜出的“封锁”方案，不是任何单一自画像的胜利。它是多幅自画像在制度性竞争中被逼出来的一个非预期的复合产物：它包含了“战士”的强硬（封锁是军事行动）、融合了“危机管理者”的克制（避免直接军事打击、为外交留出余地）、并暗中吸收了“外交家”的洞见（给对方台阶下）。这个复合产物，恰好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论断：当竞争结构保持开放时，最终的决策倾向于成为一个包含多重身份要素的混合体，而非某一幅自画像的专断宣判。

二、1965年越南升级决策：一幅自画像的征服

然而，仅仅不到三年后，同一套国家安全建制中的自画像竞争结构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1965年越南决策的漫长辩论中，“坚毅的全球卫士”自画像——其核心承载者是国务卿腊斯克，并得到总统本人最深层的身份认同——与“理性的现代化管理者”自画像——承载者是麦克纳马拉及其系统分析团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同盟。这个同盟不是出于利益交换，而是因为它们在“我们是谁”这一问题上的底层叙事有着深层的共鸣：腊斯克的“坚毅卫士”需要一个能够“科学地证明”坚毅是可行的工具；而麦克纳马拉的“现代化管理者”需要一个能够让系统分析有用武之地的危机。二者互相需要，互相赋权。

与此同时，“审慎的监护人”自画像——承载者是鲍尔——处于结构性的弱势。鲍尔的论证不是基于利益或立场，而是基于一种更深的历史感知：这场战争不值得打，不仅因为它赢不了，而是因为它本身是错误的，会耗尽帝国的根基。但如前所述，这种论证触动了存在性焦虑——它所挑战的不是一个政策选项，而是整个“我们”的自画像的可欲性。

在白宫会议的讨论中，据《五角大楼文件》汇编及相关研究，鲍尔的立场反复被概括为“欧洲式的谨慎”。这个定语本身就完成了一次身份划定：他是“欧洲”的，不是“我们美国”的。麦克纳马拉的系统分析技术在这个身份征服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当鲍尔论及“北越民族主义的不可计量性”时，麦克纳马拉的团队拿出了量化报表。《五角大楼文件》事后披露的分析过程表明，许多关键参数缺乏任何可靠的实证基础，充满了主观且乐观的赋值。但在当时的决策会议上，这些数字的功能并非为了“精确计算”。它们的功能是权力的戏剧化：向决策桌传递一条信息——我们掌握着“科学”，他只有“直觉”。这是一场科学对直觉的象征性胜利，更是“现代化管理者”这一自画像对“老派绅士”的身份胜利。

约翰逊总统最终接受了麦克纳马拉方案所提供的路线。据达莱克的传记研究，约翰逊并非真的相信了模型的准确性。他是在深夜的焦虑踱步中，抓住了一个能够让他继续满足“坚毅卫士”自画像所要求的不退让、同时又能用“科学合理性”来暂时压制内心那个微弱质疑声音的权柄。1965年7月28日，他在电视讲话中正式宣布大规模增兵。这个决定因此不仅是一个军事方案的选择，更是一个身份的册封仪式。在经历了一场自画像之间的激战之后，“坚毅的全球卫士”——与“理性的现代化管理者”结盟——被正式册封为唯一的官方身份。从此，反对增兵不再是政策辩论，而是对“美国精神”的背叛。

两个案例的对照因此清晰地揭示了：当竞争结构开放时（古巴），决策倾向于在多重自画像的撕扯中结算出一个复合的、包含克制元素的妥协产物；当竞争结构封闭、一幅自画像得以征服其他意象时（越南），决策就被专断地锁死在单一选项上。构成“开放”与“封闭”之别的关键制度要素，在ExComm的案例中可以清晰辨识：有一个受到制度性保护、享有独立信息渠道和直接向最高决策者呈报权利的异见群体；异见的承载者——即使是史蒂文森这样被私下嘲讽的人物——没有被身份标

签驱逐出“我们”的范畴；最终的决策并未被任何单一自画像所垄断。而在1965年的越南决策中，这三个制度要素一并缺席。

六、与竞争理论对质：不可还原校验与证伪条件

一个新判断如果没有经历过与最强劲既有理论的正面碰撞，就只是一次命名练习。本节的任务，是系统性地将“自画像征服”与五组与之最可能重叠的竞争性解释——本体安全理论、历史类比理论、官僚政治模型、群体思维模型、承诺升级理论——进行对质，逐一切出它们各自的代理变量与本文判断之间的分离点。本节同时承担不可还原硬校验的功能，并在最后给出明确的证伪条件。

一、与“本体安全”理论的对质

本体安全理论——以布伦特·斯蒂尔、卡塔里娜·金瓦尔、詹妮弗·米岑等人的工作为代表——论证了一个重要的机制：国家不仅追求物理安全，还追求“本体安全”，即对自我存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的确信。当一国的连续性叙事受到威胁时，它可能通过对外部敌人的暴力行动来重建这种叙事确定性。

“自画像征服”与“本体不安全”共享了“身份叙事受威胁→对外行动”这一基本洞见，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分离点。本体安全理论的核心变量，是叙事连续性是否受威胁——这是一个程度变量，预测为“威胁越大，对外行动越可能”。然而，这一变量无法区分“身份威胁引发战争”与“身份威胁被克制处理”的边界——因为在这两类案例中，叙事连续性受威胁的程度往往相当。本文的变量，是多幅自画像之间的竞争结构——这是一个权力配置变量，预测为：即使在同等程度的叙事连续性威胁下，竞争结构的开放与否，将系统性地影响最终决策是否走向战争。这一辨别面不能被本体安全理论的既有概念所吸收，因为它测量的是一个本体安全理论所不测量的维度——不是“身份是否受威胁”，而是“身份内部的多重可能性是否被权力场域所封闭”。

金瓦尔的工作确实处理了“多个身份叙事竞争”的问题，但她将其解释为“不安全感的来源”而非“制度结构的分岔变量”。本文在此基础上推进了一步：不是竞争本身导致了不安全，而是竞争的胜负条件——具体而言，制度是否保障异见者享有不被身份标签驱逐出“我们”的权利——决定了危机是否走向战争。这是本体安全理论所未覆盖的辨别面。

二、与“历史类比”理论的对质

康的《类比之战》精细地展示了“慕尼黑类比”如何在越南决策中锁死了政策选项、压制了异见。这一分析与本文的经验描述高度重叠，但二者在解释变量上存在一个关键的不可通约性。

康处理的核心变量是认知框架的锁定：决策者“误以为”越南是另一个慕尼黑，因此采取了一套“适用于”1938年的政策。这一变量的预测是：如果能提供足够强的反例证据证明“这一局势不同于慕

尼黑”，认知框架就可以被松动。但本文在档案中观察到的机制并非如此——约翰逊和腊斯克对越南的执着，并非因为他们真的“误以为”越南局势等同于1938年的欧洲。腊斯克在私下场合曾承认越南和慕尼黑在地缘政治上有很多不同。但对他而言，“慕尼黑类比”不仅仅是一个认知工具——它是他作为外交官一生的身份印记。使用这一类比，不是在“分析局势”，而是在“宣誓身份”。放弃它，不是一次认知更新，而是一次身份背叛。

因此，本文与康的辨别面在于：康处理的变量是“认知框架是否被不当类比所俘获”，本文处理的变量是“身份叙事是否被沉没成本与官僚审美所锁定，以至于即使认知上意识到局势不同，身份上仍无法承受撤退的代价”。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尽管“慕尼黑类比”同样被反复提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慕尼黑类比力主空袭），肯尼迪仍能选择克制——因为在那场竞争中，认知框架并未与单一的、被权力垄断的自画像结成不可动摇的同盟。

三、与“官僚政治”模型的对质

艾利森的官僚政治模型已充分覆盖了“不同官僚集团携带其组织身份进行博弈”的机制。本文与Model III的辨别面在于：Model III处理的是利益/立场的博弈——这种博弈在原则上可被妥协、可被交易、可被轮换。本文处理的是存在性自我叙事的生死战——当鲍尔论证“这场战争本身是错误的”时，他提出的不是一个可在下一次预算分配中用一座基地来交换的立场。他挑战的是那幅“坚毅卫士”自画像的合法性本身。这种挑战不可被“部分满足”——它只能被征服或被承认。

这一辨别面的操作化在于：Model III预测，如果给予鲍尔所在的机构（国务院）更多的预算和权限作为交换，他可能会软化立场；本文预测，即使给予更多的制度激励，一个触及身份合法性本身的反对声音也不会因此而被收买。这种预测差异是可检验的。

四、与“群体思维”理论的对质

欧文·贾尼斯的“群体思维”模型认为，个体在群体压力下放弃独立判断，以维持群体凝聚力。但越南决策的过程并非如此。鲍尔没有放弃独立判断——他反复提交备忘录，在会议上清晰陈述反对立场。约翰逊也没有简单地“从众”——他深夜里独自阅读鲍尔的备忘录，被其内容所困扰。换言之，这场悲剧不是在“个人判断被群体压力融化”的意义上发生的，而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发生的：即使异见被充分表达、即使领袖本人内心深处对异见的部分有效性有所感知，这场异见仍然在权力场域中被征服了。这不是认知一致性的压制，而是身份一致性的政治征服。群体思维解释个人如何被群体闷死；自画像征服解释的是，在个人能够说话、甚至已经被听见的情况下，为什么那个说话者和他所代表的自画像，仍然会被制度性地击败。

五、与“承诺升级”理论的对质

承诺升级理论——以巴里·斯托等人的经典研究为基础，结合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论证了决策者在面临“损失框架”时，倾向于继续向一个已经失败的事业追加投入，以规避对“沉没成本”的承认。本文与承诺升级的辨别面在于：关键变量不是沉没成本的数量大小，而是沉没成本的叙事编码。

同一数量的沉没成本，在某些情境下被叙事编码为“已经花掉的预算”（可被视为坏账而止损），在另一些情境下被叙事编码为“神圣的血债”（撤退即亵渎）。承诺升级理论只能预测“损失越大越难收手”的连续效应；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损失规模相当的不同案例中，决策者有时撤退、有时押上全部身家——因为前者将损失视为“坏账”，后者将损失视为“血债”。这一辨别面需要引入“叙事转化”这一新变量，而这是承诺升级理论的数量逻辑所切不开的。

六、证伪条件

本文的判断若要经得起反驳，就必须给出其会被证伪的明确条件。

第一，制度性异见机制虚置检验。本文的判断蕴含一个可检验的预测：当决策系统内存在一个制度性地受保护、享有独立信息渠道、并以直接向最高决策者提交反证为职责的异见机制时，自画像征服导致战争升级的概率将显著降低；反之，当此类机制存在但被实质性地虚置——即其反证被提交、却未被决策会议实质讨论或被身份标签所取消——而最终仍然走向了战争升级，则本文的判断在单次案例中受到削弱。如果在多个案例中均可观察到“制度性异见被充分讨论且真实地影响了决策者的信念，却仍未能阻止战争”，则本文的判断需要被修正或限缩其适用范围。这一条件是可观察的：会议记录、备忘录与后续的决策者证词，可以揭示异见在多大程度上被“充分讨论”以及它是否真正动摇了决策者的信念。

第二，叙事征服缺席检验。本文判断的另一个可检验预测是：决策者在选择战争时，其内部话语的核心主题应当是“我们退不得——退即否定我们是谁”，而非“我们算过了，打赢的几率大于五成，值得一搏”。如果在未来的档案解密中，反复发现决策者在完全清醒、异见被充分制度化地保障并真实竞技、且决策者自身事后承认“当时并非觉得不战即失去身份，而纯粹是基于得失计算选择开战”的案例，则本文判断的解释力将被实质性地削弱。

这两个条件将理论置于可裁决的范围之内。它们不要求观察者去测量不可观察的心理状态，而是诉诸可核查的制度代理变量与话语痕迹。当一个理论的证伪条件能够被如此明确地规定时，它就主动将自己置于了可能被推翻的风险之中，从而完成了其作为科学命题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七、结论：为自画像的迷宫设一把无法移除的椅子

战争，往往不是在黑暗中突然逼近的猛兽，而是一个我们以为忠实于己的侍从，缓缓转身，露出我们最不想面对的那个被骄傲层层包裹的自己的面容。本文的论证，试图将战争起源的追问从“理性的算计”与“系统的锁定”这两根静止的梁柱间，推入一个更幽蔽、更灼热的领域——那里有我们拼命维护的、关乎“我们是谁”的集体自画像。

本文从既有解释的锋刃处启程，通过逐层撤销“国家作为单一理性主体”的预设，逼出了一个发生学判断：战争的“必然性”往往不是被算出来的，而是被一幅特定的自画像在权力场域中征服其他可能导向克制的自画像之后，被专断地宣布的唯一结局。本文并非主张自画像征服是战争唯一的驱动力，而是将其严格限定在如下条件中：当其他重要变量——如地缘利益、军事能力对比、对方行为——较为恒常或已被既有理论充分解释时，自画像征服作为自变量之一，解释了为什么决策系统会在多个可行的选项中专断地锁定“战争”而非其他替代路径。

由此，维系和平的条件，在最深的层面上，关乎的不是如何设计更精密的算法来计算威胁，而是如何在一个国家的安全建制内部，蓄意地、制度性地阻碍任何单一自画像取得对叙事的永久垄断权。这不是一个柔软的文化呼吁，而是一个严格的制度命题。它要求，在国防资源分配中为那些不会产出短期安全产品、却持续挑战主流自画像的“非经济性”分析——深入的区域文化研究、战后责任审计的先期推演、独立的二轨外交——保留一个免受“效率”审查的容身之所。它要求，在决策流程中，为那个问“我们是否可能错了”的声音提供一个制度性的“异议者之席”：一个独立于主流论证团队、享有对等信息与对等呈报权限、并将向最高决策者提交反证作为其唯一制度任务的机构。

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要设立了对等的制度，和平就可以被一劳永逸地锚定。恰恰相反，这种制度性安排所带来的，只是一种脆弱的、持续被权力场域的引力所威胁的暂时平衡。它为那些被主流自画像压制的声音提供了一把椅子，但并不能保证这把椅子不会被下一轮政治清洗撤走。和平不是被制度设计“解决”的问题，而是被制度设计“持续地重新处理”的问题。它的每一次幸存，都是在特定权力配置下被偶然结算出来的临时结果——随时可能在下一次危机中被重新结算。我们可以为之努力的，不是彻底消灭战争的根源，而是让没有任何一幅自画像能够获得不可动摇的垄断叙事权——在它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前，让另一个声音被有尊严地听见，并且其被听见的权利不取决于个别领袖的雅量，而取决于一种蓄意的、不轻易被撤走的制度安排。

自画像何时成为战争机器

本文所说的“自画像”不是国家宣传的一般比喻，而是一个闭环机制：国家先以理性尺度描述自己，再把尺度之外的现实解释成异常，最后把消灭异常当作维护理性的义务。战争并非理性失效后的坠落，而可能是自画像成功闭合后的执行。

反例边界也必须明确：若一个国家的自我描述越统一、异质经验越被排除，其对外强制却持续下降，并且下降不能由资源、联盟或威慑解释，那么“自画像闭环推动战争”的机制判断应被放弃。

参考文献

- Allison, G. T.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 Dallek, R. (1998). *Flawed Giant: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1961–197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lul, J.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 Halberstam, D. (1972).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 Janis, I. L. (1972). *Victims of Groupthin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263–291.
- Khong, Y. F. (1992).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nvall, C. (2004). Globalization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 Self, identity, and the search for ontological secur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25(5), 741–767.
- McMaster, H. R. (1997). *Dereliction of Duty: Lyndon Johnson, Robert McNamara,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the Lies that Led to Vietna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Mitzen, J. (2006).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3), 341–370.
- Scott, J.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eehan, N., Smith, H., Kenworthy, E. W., & Butterfield, F. (1971). *The Pentagon Pape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Bantam Books.
- Staw, B. M. (1976). Knee-deep in the big muddy: A study of escalating commitment to a chosen course of ac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6(1), 27–44.

- Steele, B. J. (2008).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London: Routledge.
- Weber, M.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5)
- Wendt, A.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